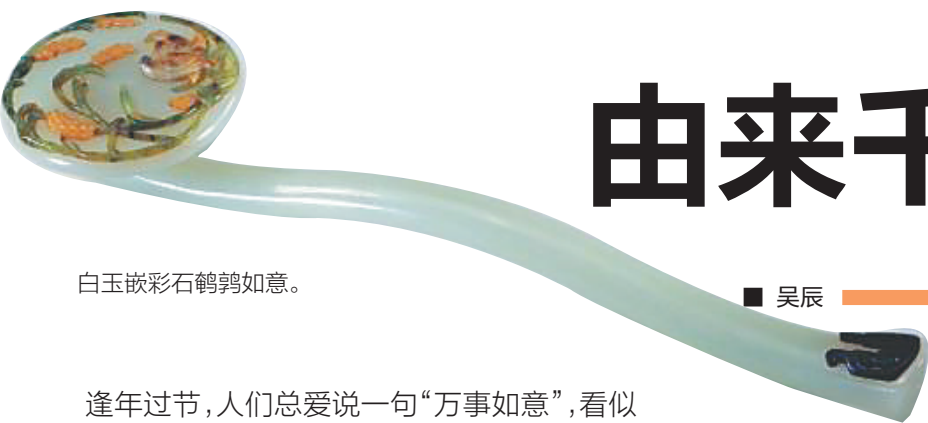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春秋



白玉嵌彩石鹤鹑如意。

■ 吴辰

由来千古如意事

如意的前身是痒痒挠

一位僧侣的记述倒是可行度极高，他说如意就是古时候的“爪杖”，是用骨头、兽角、竹木等物雕刻成人的手指状，脊背上有搔痒之处为手之不能及时，也可以不用烦劳他人。这种器具能够如人之意，所以称之为“如意”。而古印度也有一种类似的器具，僧侣在各地行走化缘的时候常会随身携带，称为“阿那律陀”，意为“无灭”，而其作用则与中国的爪杖别无二致。“阿那律陀”又被译为“如意”，也许正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来自考古学家的发掘更证明了如意历史悠久。在对山东曲阜鲁国故城

进行发掘的过程中，曾经发现过两件牙雕残器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东周列国时期，器物一端被做成了手掌形状，指尖向下弯曲，手腕处链接圆柱形长柄。这一形制与我们现在所用的痒痒挠别无二致。

可见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，“如意”这一器具的发明和使用都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其形制不断发生变化，一部分做工精美的从实用器变成了陈列器，如意也与痒痒挠分道扬镳了。从实用器向陈列器转化的背后是历史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。

古代人的如意情结

柄如意。

爱如意的并非仅有李克用和王戎，不少将军上阵指挥千军万马靠的便是一柄如意。梁代韦睿出征时便是一柄白角如意指挥麾下将士，所到之处战无不胜；而齐高帝萧道成常在书桌上摆放一把铁制的大如意，一方面可以当镇纸使用，另一方面当有刺客图谋不轨时，也可以当作手杖，与敌人搏斗。北魏宣武帝元恪少年时，父亲孝文帝组织皇子挑选宝物以考验他们的志向，别的皇子们都挑选些金银珍玩，惟元恪挑选了一柄骨质如意。果然，元恪成年后继承了王位，北击柔然，使国力极一时之盛。

出家人更爱如意。如意的起源本就与佛教有关，在流传的过程中，道家等其他宗教也对如意情有独钟，历朝历代，如意总与僧侣相伴。齐高帝笃信佛教，其赠与僧侣的礼物也常常是竹根如意，虽然并非贵重之物，但是出家人不理凡尘，竹根如意的高洁与僧

诗词中的如意

宋代谢翱也有名诗《铁如意》，“仙客五六人，月下斗婆娑。散影若云雾，遗音查江河。其一起楚舞，一起作楚歌。双扶铁如意，击碎珊瑚柯。一人夺执之，睨者一人过。更舞又一人，相向屡傞傞。一人独抚掌，身挂青薛萝。夜长天籁绝，宛转愁奈何。”此诗据传是谢翱为文天祥招魂所做，原本寄托美好情感的铁如意转瞬变成了金戈铁马的信物。

而乾隆皇帝所做的《咏白玉如意》

侣则是再搭配不过的了。日本奈良正仓院藏有一柄犀角如意，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，上边镶嵌有水晶、象牙、黄金、珍珠等物，乃是当时高僧大德参加法会时所用，足见得如意对于僧侣的重要意义。

当然，最爱如意的莫过于帝王之家。清代康熙盛世，每逢祝寿贺喜，必使王公大臣进献如意，乾隆曾有诗云：“处处座之旁，率常陈如意”，而慈禧六十六岁大寿时，竟有官员一次献上九盒共八十一柄如意，称之为“九九如意”，其精巧程度为历代所难以企及。

则寄寓了一代明君在新年对国家的关心：“和闾供岁供，制器玉工闲。虽曰来之易，能忘获以艰。新年符吉兆，代语得心闲。永愿洗兵马，休言致白环。”看来，贵为天子的乾隆也并非不知这白玉如意的来之不易。

如今，虽然人们并不经常使用如意，但是，如意何尝离开过我们的生活，逢年过节，只要互相道一声“万事如意”，如意就在我们的心里。

在上学时，我们都学过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教书先生的高声朗诵令人印象深刻，其内容是“铁如意，指挥倜傥，一座皆惊呢；金叵罗，颠倒淋漓噉，千杯未醉噉”，先生口中的诗文出自清代刘翰的《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》，原文“铁如意”实则是“玉如意”，方是时也，李克用尚为唐军大将，征战得胜后置酒于三垂岗上，在席间，有伶人奏陆机的《百年歌》，叹人间无常，举座皆喟叹，而李克用听后却手挥玉如意谈笑风生，为后世之美谈。

李克用手挥玉如意之举其实并非原创，他乃是效法与陆机同时代的古人王戎。王戎乃是竹林七贤之一，以处乱不惊著名。据说，在西晋八王之乱中，王戎也颠沛流离，但即使在朝不保夕之间，王戎也未曾有过害怕的表情，并常常挥舞如意召集亲朋故旧宴乐。“王戎舞如意”遂成典故，在有王戎出场的画作中，其手中必紧持一把长

古人爱如意，也常常将其写进诗词当中。

唐朝著名诗僧皎然曾经以如意入诗赠师长：“缥竹湘南美，吾师尚颀形。仍留负霜节，不变在林青。每人杨枝手，因谈贝叶经。推期沃州讲，持此别东亭。”竹子虽然已经不复原貌，但是将竹子做成的如意持在手中，则会想起师徒坐而论道的日子，如意虽小，大道至深。

《诗经》里的郁郁文风

■ 李营营

《诗经》“文”字出现59次。从甲骨卜辞等文献来看，商代尚未摆脱原始粗野状态，鲜少考虑对人格、精神的提升。周代则注重以“文”来发掘人的价值，力求高雅与文明。《论语·八佾》记载孔子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《诗经》时代制礼作乐，文风弥漫。

文德政治

西周推行文治，崇尚“文王之典”，多以文德而非武力来治理天下，以德性而非霸道来协调社会关系。殷商时期，周偏安于岐山之下，它的兴起与文王密切相关。文王以德治岐，积善行仁，大化天下，使许多诸侯臣服于周。在修文德、行文治方面堪称典范。“允文文王，克开厥后”（《周颂·武》），文王开创文治，福泽后人。以至到孔子时，仍将文王视为文治典范，并以其后继者自居。即《论语·子罕》所云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武王灭商后，“偃武修文，归马于华山之阳，放牛于桃林之野”（《尚书·武成》），“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”（《周颂·时迈》），推行文治，志在建立文雅有序的道德社会与文明国家。周公制礼作乐，将文王开创的文德政治落实为具体制度。通过礼乐，使周人从野蛮状态摆脱出来，万事依礼而定，举止依礼而行。西周的文德政治，可谓起于文王，成于周公。

周代的文治传统蔓延于外交、军事领域。春秋时期，邦国之间赋诗外交，多有含蓄文雅之风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三年》记载，重耳流亡于秦，秦穆公宴请重耳。宴会上，重耳吟《小雅·沔水》，沔水归大海，以表达自己对秦国的尊重和向往。秦穆公吟《小雅·六月》，暗喻将助重耳为君，复兴晋国。重耳连泣拜谢。可见通于诗意、长于文采是外交成功的必要因素。甚至，在军事上仍可看到文德的影响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记载，楚庄王取得郢之战的胜利以后，不仅反对收集敌人尸体展示武功，反而大讲用武之德。“夫文，止戈为武。武王克商，作《颂》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时夏，允王保之’”。从文字构造的角度，说明用武必须以文德作为统领。《诗经》所彰显的文德政治，弥漫于邦国内外，铸造了有周一代包容文雅的气魄。

文化生活

周人尚文，还体现在个人日常生活的雅化，涵盖了服饰、仪表、器物、礼仪等方面。

中国历来是衣冠上国，在服饰中蕴含着尚文精神和精深的礼仪。周人的服饰以色彩、规制等的不同，来体现不同的身份等级。《礼记·月令》云：“季夏之月……命妇官染采。黼、黻、文、章，必以法故，无或差贷；黑、黄、赤、苍，莫不质良，毋敢诈伪。以给郊，庙祭祀之服，以为旗章，以别贵贱等给之度。”染官给丝帛染彩，制作不同的旗帜和官服，区别贵贱等级。不同官爵穿不同命服。

周人讲究威仪之美。周人擅长用佩玉、飘带等饰物，来使仪态婀娜有度。如《郑风·有女同车》云：“将翱将翔，佩玉将将”，其将邀将翔之时，所佩玉饰叮当作响，行步皆中节律。《礼记》也曾记载了玉在周人仪态塑造中的重要作用。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“既服，习容观，玉声，乃出”，君子穿好朝服之后，要先练习上朝的仪容，听佩玉的鸣声是否与步履协调，然后才能出门。可见，玉已经成为礼仪的一部分，君子借玉以养成良好的威仪。

周代的器物，无不精致考究。《诗经》出现了簋、筩、豆、登、房、匕、俎等种类繁多的食器，以及不同功能的酒器。如壶、盂、觥、卣等盛酒器，爵、斚等温酒器，匏、斗、瓚等舀酒器，尊、觥、爵等饮酒器。兵器除了实用，也讲究形制的精美。在周代，用度器物所呈现的文化含量，前所未有地高涨。

周代百礼皆至。中国历史上最早将“礼”“仪”二字当作一个词来使用，就见于《诗经》。《小雅·楚茨》云：“为宾为客，献酬交错，礼仪卒度”。正是《诗经》的记载，展示了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的周礼之盛。祭祀、燕礼等诸多礼仪仪式，无不周密完备。《小雅·宾之初筵》云：“烝衎烈祖，以洽百礼。百礼既至，有壬有林”。“至”形容礼仪完备，“壬”形容大，“林”形容盛，连用三词来显示祭祀的重大完备。可以说，周人的吃穿用度、行走坐卧，无不纳于礼中，呈现前所未有的文明之姿。

周代自上而下弥漫的文风，并非单纯追求外在形式之美，旨在培养德性文雅的君子。《卫风·淇奥》云：“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”，君子切磋琢磨以修炼美好的品德，塑造文质彬彬的气质。因为对“文”的崇尚，周代贵族多以“文”为谥号。贵族女子中，也有以“文”为称者，如晋之文嬴，鲁之文姜等。”

《诗经》时代的贵族对“文”推崇备至，普通民众也是尚文的。周代宗法分封制度将贵族与平民纳入同一网络，在紧密交织的关系中，贵族势必将其言行举止、审美情趣传至下层社会，形成一以贯之的文雅之风。

文史荟



投稿邮箱 hnrbyfb@sina.com

笔砚清玩



《汉宫春晓图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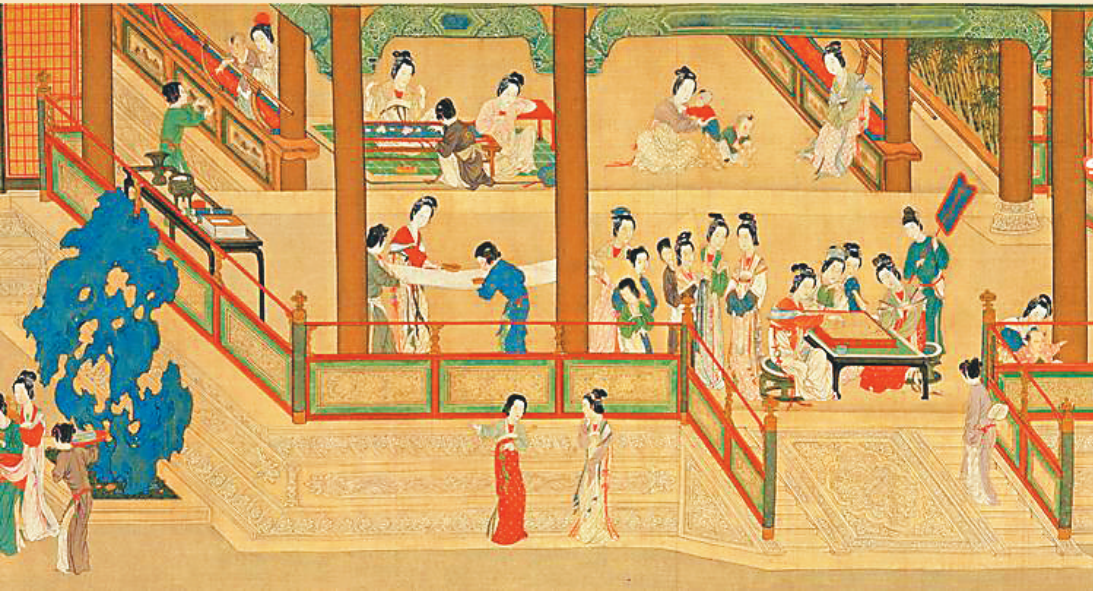
《汉宫春晓图》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《汉宫春晓图》是仇英平生得意之作，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，亦被誉为“中国‘重彩仕女第一长卷’”。

仇英在绘画上以“重彩仕女”著称于世，《汉宫春晓图》便是仇英重彩仕女画的杰出代表。此图勾勒道劲而设色妍雅，画家借皇家园林殿宇之盛，以极其华丽的笔墨表现出宫中嫔妃的日常生活，极勾描渲染之能事。不仅是仇英平生得意之作，在中国重彩仕女画中也独树一帜，独领风骚。

仇英是明代的代表性画家之一，与沈周、文徵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称为“明四家”，亦称“天门四杰”。他擅人物画，尤其是仕女，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，笔力刚健，特擅临摹，粉图黄纸，落笔乱真。人物造型准确，概括力强，形象秀美，线条流畅，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，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。

（杨道 辑）



据传，元宵夜张灯源于民间“开灯祈福”古俗。但史料载，至唐初，元宵节张灯才成为法定之事。

唐郑处海笔记小说《明皇杂录》多次提到唐明皇李隆基操办元宵晚会的盛况。其中“逸文”谓：“遇正月望夜，移仗上阳宫，大陈影灯，设庭燎，自禁中至于殿庭，皆设蜡炬。连属不绝。”当时有个叫毛顺的大工匠，别出心裁地制造了一栋30间、高一百五十尺的灯楼，“悬珠玉金银，微风一至，铿锵成韵。”缘何如此，“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”。唐京城洛阳元宵夜是“共道春灯胜百花”，乡野的“山灯”也不逊色。李商隐曾感慨：“初烁空城谷，漫若朝炬。忽惊狂烧卷风，扑缘一峰，如尘烘旗色，如波残鲸鬣，如霞駸，如珊瑚露，如丹蛇虫蛭离，如朱草从丛，如芝之曲……”

如果说唐代元宵夜呈现了“千门开锁万灯明”盛况，那宋代元宵节不仅“花

市灯如昼”，而且宋代人还将灯的各种作用发挥到极致。欧阳修、孟元老分别在史料笔记《醉翁谈录》和《东京梦华录》详细介绍了北宋首都开封元宵夜争奇斗艳的“灯市”：万盏彩灯垒成灯山，花灯焰火，金碧相射，锦绣交辉，“乐音喧杂十余里”“万家灯火暖春风”。即便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，当时杭州元宵夜不仅“灯如旧”，且推陈出新出一批“灯饰”精品。南宋文学家周密史料笔记《武林旧事》卷二“元夕”条曰：“（杭州）一入新正，灯火日盛，皆修内司诸分主之，竞出新意，年异而岁不同。”其“灯品”条宛如一幅“灯饰博览会”微缩图：“灯品至多，苏、福为冠，新安晚出，精妙绝伦。”有巧夺天工的“无骨灯”“珠子灯”“羊皮灯”及系列品牌的“罗帛灯”“戏影灯”“绢灯”等。可以说，中唐至宋，元宵节已演变成全民狂欢。

其实，宋代元宵的花灯焰火，不仅

照耀通宵、引爆娱乐、助推经济、点亮了文人骚客的诗情，也令一些基础管理者脑洞大开，开发出教育人、引导人弃恶从善的“警示灯”。《武林旧事》卷二“元夕”条说，元宵放灯之期，“三狱亦张灯建净狱道场”，利用灯饰、图像展示“狱户故事”，并“陈列狱具”，这对潜在的不法分子是一种警示与威慑。而南宋首府杭州市的“元宵警示”别开生面，在“繁闹之地”的西坊点燃巨烛，“照耀如昼”，狱警押着囚犯数人，并在布帛上写明他们具体的犯罪行为：“某人为不合抢扑钗环，挨搪妇女。”意思说，这些不法分子乘人不备抢夺观灯妇女的钗钗饰物，或趁人流如潮对观灯女性耍流氓。然后，当时的杭州官员当众宣布对他们的法律惩罚。

当然，这只是一场表演，谓之“装灯”。那些被当众宣判的囚犯，并不是真的犯了盗抢财物与调戏妇女之罪。

这些被官府安排当一回临时“演员”的，其主要作用是“借此以警奸民”。官府还以此为契机，“分委府僚巡警风烛，及命都辖府使臣等，分任地方，以缉奸盗”。运用全民狂欢之“道具”花灯，制作“警示灯”，开展“法制警示教育”，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

《观灯图》（南宋）李嵩

宋代元宵的『警示灯』

■ 赵柒斤

民间词语

